

日籍前解放軍官兵 的民間寫作

• 董炳月

一 邊緣人的記憶與敘述

「日籍解放軍官兵」這個特殊群體是抗日戰爭結束後在東北地區形成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傀儡政權「滿洲國」隨之解體。共產黨部隊進駐東北之後，某些滯留東北的日本殘兵和日本民間人士由於種種原因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八路軍、東北民主聯軍）。根據在日本國內活動的「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義光（1923- ）從日本厚生省（相當於中國的民政部）得到的資料，1953年和1958年，滯留中國的日本人兩次大批回國，七千餘名歸國者中參加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有四千名左右。

日籍解放軍官兵是一個典型的「邊緣群體」。就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而言，甲午戰爭之後五十年間加害與被害的關係簡單、清晰地將兩國民眾劃分為兩個對立的群體，同時將兩國民眾高度「國民化」。在這個「國民」對立的大背景上，日籍解放軍官兵的位置顯然有些曖昧並且有些尷尬。就人口數量而言，當時中國的人口約四億，日本的人口約七千萬，在這兩個大數字的夾縫中，四千這個數字很小。

不過，儘管是一個小小的邊緣性群體，但他們作為「特殊國民」經歷了身份的巨大轉換——由日本人（或日軍士兵）經過「滿洲國國民」這一過渡，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員。這種外在的身份轉化過程中包含的內在精神緊張，集中了近代以來東北亞社會的諸種複雜性，具有獨特的認識價值。

可惜，由於身份的「邊緣性」，當他們離開中國的時候，其人生經歷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記憶就受到抑制。日本人素有「記錄癖」，不少日籍解放軍官兵在中國軍隊中戰鬥、生活的時候寫了日記，但他們返回日本的時候，中國政府從日本的社會狀況和他們的處境考慮，請他們將日記以及軍功章等物品留下，甚至對他們帶回國的照片進行特別處理——比如剪掉照片上的一些敏感題字等等。1972年中日關係正常化之後，中村義光多次給周恩來寫信，並與大陸政府的駐日機構交涉，希望中國將那些軍功章、紀念章等物品交還給日籍前解放軍官兵，但那些東西已經下落不明。這種「抑制」無疑會影響他們晚年的回憶錄寫作。今村匡平（1921-94）當過七年解放軍軍醫，曾經冒着彈雨在戰場上搶

1945年日本投降，共產黨部隊進駐東北。約有四千名滯留東北的日本殘兵和日本民間人士由於種種原因加入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儘管他們是一個小小的邊緣性群體，但他們作為「特殊國民」經歷了身份的巨大轉換。在這種身份轉化過程中包含的內在精神緊張，集中了近代以來東北亞社會的諸種複雜性。

救傷員、清點犧牲者的遺體，身上沾滿鮮血。他在1967年寫成的《在紅星下》（《赤い星の下で》）的序言中說：

從軍期間的日記是廣錄見聞，但回國時被沒收。寫作該書是憑記憶和回國後做的零散筆記。

2002年4月，筆者在東京見到曾經擔任軍醫和護士為解放軍服務七年的相原協（1917- ）、相原慶子（1927- ）夫婦，他們也談及回國時日記被沒收。同樣是由於身份的「邊緣性」，這一群體難以進入正統的歷史敘述。在日本社會他們自然被主流社會和歷史學者所漠視，即使在中國，了解他們的人也不多。就筆者所見，寫及他們的中國歷史著作僅有近年出版的《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①。

使他們從迷茫的歷史煙塵中浮現出來的，是他們的自述。

今年4、5月間，筆者在東京採訪某些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傾聽他們的自述，並且收集到十多種回憶錄。這些回憶錄大部分寫在80年代之後，這是因為20年代出生的日籍解放軍官兵在80年代大都到了「定年退休」、回憶往事的年齡。而且，隨着80年代以來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中日交流日益頻繁，這些當年在中國度過青春時代的人舊地重遊、撫今追昔，開始把回憶付諸筆墨。

他們的著述活動屬於典型的「民間寫作」。這裏所謂的「民間寫作」是相對於官方寫作（以及與此存在共謀關係的學院派寫作）而言的，可以從創作動機、出版形態等方面界定。就職業而言，日籍前解放軍官兵既非「史官」，亦非大學、研究機構的歷史學者，無論從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說，還是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

說，他們都沒有敘述歷史的權力，也不承擔敘述歷史的責任。筆者結識的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大都是醫護人員、公司職員，或者小業主、公務員。促使他們拿起筆來的，是源於他們獨特人生經歷的內在衝動，其回憶錄寫作的出發點是撰寫「個人史」。他們企圖通過寫作把自己的歷史當做一種「遺產」留給自己的後代，同時幫助日本人認識歷史、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原解放軍衛生工作者橫山甲子藏（1924- ）在自傳《流轉之青春——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從軍記》^②「後記」中說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

記憶屬於一代，記錄傳至末代。我有兩個兒子，但我沒有任何遺產能夠留給他們。不過，我想把作為父親青春時代的人生軌跡當做僅有的遺產留下來。如果某一天兒孫們打開這本書，能夠記起先輩的生活情形，一代一代都能領會其中的意義，把日中友好之燈接過來、傳下去，我會感到無上欣喜。

中村義光、幅敬信（1924- ）等人在自傳或自述中都表達了類似的願望。換言之，回憶錄寫作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內在需求」而不是一種「工作」。他們設定的讀者對象也不像官方寫作、學院派寫作所設定的那樣龐大。這種寫

下圖是日籍前解放軍官兵與中日戰友合照（左起：加藤典二、今村匡平、呂競擇）。這些日籍前解放軍官兵通過寫作把自己的歷史當做「遺產」留給後代：「如果某一天兒孫們打開這本書，能夠記起先輩的生活情形，領會其中的意義，把日中友好之燈傳下去，我會感到無上欣喜。」本文中書影都是這些回憶錄封面。



今村匡平之女川手敏江提供



作動機及其著者自身的邊緣性，決定了其著述出版形態的民間性。筆者蒐集的同類著述大都是個人印行，有的印刷和裝訂都比較粗糙。即使是正式出版者，出版社也大都名不見經傳。在出版資本主義對「話語權」的壟斷之中，同類著作未能進入日本的大眾傳播系統。耐人尋味的是，這些與中國具有特殊關係的日本人的自述也很少被翻譯為中文。就筆者所見，同類著述中有較多中文翻譯的是今村匡平的幾本著作，但出版社也是「邊緣性」的——比如廣西人民出版社和中國農民出版社等等。川畑一子(1931-)的《像大河的流水一樣》(《大河の流れるように》)③雖然被翻譯為中譯本《大江東流》，2000年由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但印數只有兩千冊。

二 視角與風景

歷史寫作是將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文字化。將數十年(甚至數百、數千年)間發生的事情轉換為一冊(或若干

冊)印刷品，自然要省略許多東西。因此，綜合與概括成為眾多歷史著作基本的文體特徵。從這個角度說，正統的歷史敘述行為本身具有「反歷史」的性質。它省略(甚至捨棄)了眾多社會成員的生活實況與生活細節，而個人生活在細節之中，生命是由細節構成的。

在這方面，民間寫作可以補充正統的歷史敘述。一個人無論在社會上怎樣被邊緣化、怎樣渺小，他在其自傳中都是當仁不讓的主人公。他們敘述的是個人的生活經歷、見聞感受，展現的是原生的、故事性的生活形態。這樣，回到歷史中的個人成為回到歷史的有效途徑之一。與制度化的出版系統的疏離，也使民間寫作能夠擺脫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束縛，自由地敘述「一切歷史」。野史有時比正史更真實，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如果敘述者具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其敘述則將展現出不平凡的歷史內容。

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歷史敘述，就生動地展示了戰後初期東北社會殘酷的社會現實和人生百態。

日本投降前後的滿洲地區是一個權力交錯的地方。這裏有蘇聯紅軍、國民黨、共產黨、殘留的日本人、朝鮮人等各種勢力，還有五花八門的地方武裝。權力的交錯時而造成局部的權力真空。在這種混亂的環境中，日本「開拓民」和日本殘兵們承受着蘇聯紅軍的進攻和當地中國人理所當然的復仇，同時也被「祖國日本」拋棄，淪為「棄民」。他們的命運比日本本土的日本人更悲慘。當時相原慶子在東北的日本難民診療所救助難民，她對當時日本難民的慘狀記憶猶新：許多人從山裏逃出來，東西被搶光，形同乞丐。有的婦女正來例假，披着麻袋，幾近赤裸，任由經血黏在腿上。許多

回憶錄寫作對於日籍前解放軍官兵來說是一種「內在需求」而不是一種「工作」。他們設定的讀者對象也不像官方寫作、學院派寫作所設定的那樣龐大。這種寫作動機及其著者自身的邊緣性，決定了其著述出版形態的民間性。在出版業被資本主義市場壟斷下，這類著作尚未能進入日本大眾傳播系統。



嬰幼兒被走投無路的父母摔死扔進水井，屍體幾乎將水井填滿……。橋口傑的「終戰回憶錄」——《難忘的大地·第一部·慟哭的滿洲》④，則記錄了他親歷的蘇軍進攻和在滿日本人的逃難。橋口傑1927年生於九州島宮崎縣；1941年4月參加滿洲義勇隊開拓團前往中國東北，當時只有十四歲；1944年1月被編入特殊部隊滿洲第603特警大隊，日本戰敗後被蘇軍俘獲，其後又參加謝文東（座山雕的原型）的土匪組織；1946年8月參加解放軍。《慟哭的滿洲》寫及1945年8月9日蘇軍開始進攻之後，日本人從安東（現在的丹東）逃難的情形：雨中，「開拓民」帶着少量衣物離開駐地，沿着泥濘的道路逃亡，人哭馬叫，一片混亂。而關東軍的軍用卡車、馬車卻從人群中衝過。「閃開閃開，軍人優先」，軍人叫嚷着搶先逃走。日本難民中有四千餘名婦幼和老弱病殘，他們就是在成為「棄民」之後被蘇軍殺害。事情發生在8月20日前後，大約六千五百名日本人從饒河、密山到達勃利附近的「佐渡開拓地」。一架蘇軍飛機因為機械故障迫降在這裏，日本人上前圍

觀，飛機上的蘇軍士兵擔心受襲，開槍射擊，最後被日本人打死。明明知道蘇軍會來報復，但六千多人中的兩千餘名日本兵和少年義勇軍還是遵照命令前往牡丹江，丟下一群婦幼和老弱病殘。次日晨，駐紮在七台河的蘇軍炮兵開始炮擊這群日本人，隨即趕來的蘇軍士兵用衝鋒槍掃射，約四千五百名日本人中僅百餘人倖存。日本戰敗一年後的1946年8月，十九歲的橋口傑獨自徒步二百公里，調查在滿日本人遺址，在一個黃昏來到慘劇發生地——荒草之中白骨纍纍，西方的地平線上是巨大的落日，夕陽輝映下的白骨似乎也在燃燒……。

不過，戰敗國的國民在逃難時依然殘害中國人。成岡睦美在〈為了那場戰爭中的死者〉⑤一文中即有類似的記述。1943年，年僅十五歲的成岡參加滿蒙開拓青年義勇軍到了黑龍江的勃利，立志當農民。1945年8月9日蘇軍攻過來的時候，他正在田裏收割大麥。八百餘名開拓團員在蘇軍戰車的轟鳴聲和炮擊中逃亡。在高粱地裏，他親眼看到在炮擊中受傷的日本孕婦早產死去，看到同伴在炸彈的爆炸聲中消失，煙塵落定之後地上是殘缺不全的屍體和散落的內臟……。四散奔逃之後成岡身邊只剩下三個人，後來與百餘名持有武器的日本殘兵同行。9月中旬，這群飢腸轆轆的日本人走出山林發現一片農田，田裏三名中國農民正在收割小豆。他們大叫着衝進田裏，將三名農民捆綁起來，搶了小豆，回到林中用白鐵盆煮了吃。日落時分準備宿營之前，成岡親眼看到日本老兵用軍刀將兩名中國農民的腦袋砍落，鮮血四濺，一名農民僥倖逃走……。

此外，中村義光在〈遙遠的八月十五日〉和〈與八路軍同行〉⑥中，記述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

日本投降前後的滿洲，是一個權力交錯地區。這裏有蘇聯紅軍、國民黨、共產黨以及殘留的日本人、朝鮮人等各種勢力。在這種混亂的環境中，日本「開拓民」和日本殘兵承受着蘇聯紅軍的進攻和中國人的復仇，同時也被「祖國日本」拋棄，淪為「棄民」。敘述者具有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展現出不平凡的歷史內容。

他和同部隊的日本兵因為不願向蘇軍投降而單獨逃往日本，受阻之後加入地方的土匪組織，直至1946年春天被解放軍部隊收編。幅敬信在「自述」⑦中寫到他所在的部隊不知道日本投降，8月15日之後依然在小興安嶺的山裏流竄，從山裏出來又參加親日的地方武裝「光復軍」等等。

在這種異常的生活狀態之中，他們當中有一些人進入了解放軍部隊。其參軍動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了生活，比如中村義光在他所屬的地方武裝被解放軍收編的時候，為了生活也留在解放軍部隊。第二類是因為有特殊技能被徵用。幅敬信就是因為會使用擲彈筒，所以被八路軍從戰俘收容所直接編入解放軍戰鬥部隊。他的戰友舞田岩男（現居京都）原為日軍重機槍手，也是和他一起被八路軍從戰俘收容所徵用，編入機槍連。今村匡平熟悉醫療技術，所以被解放軍從戰俘營徵用，由日軍軍醫變為解放軍軍醫。第三類是從民間徵用的日本人。這類人中多為醫護人員，比如相原夫婦、二森範子（1929- ）。在日籍解放軍官兵中佔很大比例的日籍女護士，大都是從民間徵用的。川畑一子和《青春時代的代價——參加中國的解放戰爭》⑧一書的作者本間雅子（1924- ），都是在入伍之後才開始學習看護技術。

日本人參加解放軍部隊的動因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了生活；第二類是因為有特殊技能被徵用；第三類是從民間徵用的日本人。下圖為建國初期日籍解放軍醫護人員和中國戰友的合照（攝於江西第66陸軍醫院。左起：潘志高、川畑一子、王毓秀、齊藤妙子、岡晴之）。



川畑一子提供

顯然，日本投降、「滿洲國」崩潰之後，部分滯留東北的日本人作為「滿洲國」的一種特殊歷史遺產被中國共產黨繼承。在共產黨打敗國民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這份「遺產」發揮了重要作用。不少日籍解放軍官兵直接參加了戰鬥。根據今村匡平《在紅星下》的記述，1946年春夏之交國民黨軍隊向共產黨部隊進攻之初，在拉法附近遭八路軍部隊沉重打擊，被迫退回老爺嶺山中。而這些勇敢作戰的八路軍，實際是剛剛穿上八路軍軍裝的日本戰俘。幅敬信在四平攻城戰和錦州戰役中都英勇作戰，立下戰功，受到所屬部隊嘉獎。199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還向他頒發了特製的「八·一」紀念章。更多的人是在後勤部門和醫療衛生部門竭誠服務。據相關資料，某些解放軍野戰醫院的專業人員有八成以上是日本人，缺少了他們，戰地醫療工作幾乎難以開展。中村義光則在解放軍部隊當會計，在動盪的軍旅生活中把所在部隊的財務工作做得井井有條。

新中國沒有忘記日籍解放軍官兵的貢獻。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日本友人的時候說⑨：

我們很感謝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時期，作為醫生、護士、技術人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係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是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

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慶典的時候，相原協等人還獲邀登上天安門廣場的觀禮台。

這些人在參加解放軍之前本來是作為日本侵略中國的工具進入中國、與中國人為敵，而在參加解放軍之

後，他們的對立面依然是中國人（雖然是部分中國人）。面對這一事實，固有的「國家」、「民族」概念變得蒼白無力。實際上，「內戰」本身已經將民族意義上的「中國」解構。在「日本人幫助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作戰」這種組合中，「國家」與「民族」之上的價值出現了，解放戰爭也因此具有「國際主義」色彩。實際上，解放戰爭時期從東北南下的第四野戰軍中不僅有日本人，也有許多朝鮮人。這在中村義光的《與八路軍同行》一書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歷史敘述就是這樣展示了一個鮮為人知的世界，補充了「大歷史」的空檔，揭示了歷史的豐富性與複雜性。

三 精神世界的重建

隨着命運和人生際遇的變化，日籍解放軍官兵的世界觀和國家認同感也發生了變化。這變化在縱向上與他們的人生歷程重疊在一起並與不同的時期相對應，在橫向上則與他們對日本軍國主義非人本質的認識、與他們對解放軍的了解聯繫在一起。

在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自述中，「奔走」是一種具有象徵性的生活形態。這「奔走」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日本到「滿洲國」。當時日本人去滿洲，大都是從日本本島南端、與九州島隔海峽相望的下關附近乘船到朝鮮半島東南端的釜山，然後乘火車縱貫朝鮮半島，過了鴨綠江進入滿洲。本間雅子的自傳和二森範子的《與龍之子共生》^⑩、岡晴之（1929- ）的《青春萬里》^⑪，都寫及這個漫長的旅程。

第二階段是日本戰敗後的逃亡。橋口傑、成岡陸美、中村義光等人都經歷了這個階段。

第三階段則是參加解放軍之後隨軍入關南下，進行為期數年的超長途行軍，走遍大半個中國。作為第三階段的小插曲，還有參軍初期起因於誤解和隔膜的逃跑。中村義光參軍初期，因為隨軍的一位日本同伴被槍斃，他擔心自己會遭受同樣的不幸，便與另外兩位日籍士兵一起逃走，但被抓回。本間雅子被八路軍強制徵用後總想回日本，便趁部隊的野戰醫院從朝鮮境內撤回中國的機會逃走，但因為路途艱難又主動回來了。她的自傳《青春時代的代價》生動地描寫了逃跑的過程。

就這樣，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從日本「奔走」到滿洲，「奔走」在逃亡的路上，「奔走」到中國的南方，直到50年代「奔走」回日本，起點變為終點，完成一個輪迴。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群「奔走的國民」。也許是基於這種對空間轉換的深刻體驗，他們的自傳的書名中才總是有「移動」的意象——岡晴之的自傳叫做《青春萬里》，橫山甲子藏的自傳叫做《流轉之青春》，川畑一子的自傳叫做《像大河的流水一樣》。

在「奔走」的第一階段，這些日本兵、「軍國少年」、「軍國少女」作為日本侵略政策的工具，作為日本軍國政府海外擴張的共謀者進入「滿洲國」，因此懷有自覺的「日本人意識」。事實上，根據當時日本的國籍法，即使在進入「滿洲國」之後，他們在法律上依然是「日本人」^⑫。就像「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一樣，「滿洲國國民」的身份對於他們來說也僅僅是「傀儡性」的身份。這一事實從國民的層面反證了「滿洲國」的傀儡本質。「滿洲國」的虛幻性不僅在於外部的被動性——在制

在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自述中，「奔走」是一種具有象徵性的生活形態。這「奔走」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日本到「滿洲國」；第二階段是日本戰敗後的逃亡；第三階段是參加解放軍之後隨軍入關南下，走遍大半個中國。他們直到50年代才「奔走」回日本，起點變為終點，完成一個輪迴。他們可說是一群「奔走的國民」。

當過日本兵又當解放軍的幅敬信說：「日本軍隊打人，上級強制下級。八路軍不一樣，那是上級愛護下級、下級尊重上級！」這種認識不僅使日籍前解放軍官兵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者，甚至使一些人在思想轉變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們在解放軍部隊中形成的世界觀影響了許多回國官兵的後半生。

度的層面上它是一個「強制性的共同體」，從內部而言，國民也沒有進入、甚至排斥共同的「國家想像」，因而僅是「被動性國民」。東北的許多日本人如是，在東北抗日的中國人亦如是。在滿日本人的「日本人意識」和在「滿洲國」的領地內英勇抗日的楊靖宇等人的「中國人意識」，從不同的角度同樣證明着「滿洲國民」的虛幻性。

進入「奔走」的第二個階段（逃亡）之後，他們雖然嚮往着故國日本，但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日本意識」已經崩潰。成為「棄民」、成為國家殖民國策犧牲品之後的悲慘遭遇使他們認識到日本軍國主義的「非人性」。這裏有「階級意識覺醒」的成分。相原慶子對筆者談起當年的日本難民時明言：關東軍利用手裏掌握的鐵路等交通工具逕自逃走，丟下老百姓不管了。橋口傑的《慟哭的滿洲》一書不僅寫及「皇軍」逃跑時對難民見死不救，還記錄了當地日本軍人、警察、官員的家屬如何在平民不知情的情況下事先撤離。「棄民」悲慘逃亡的事實，從「國民」的層面上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並且觸發了對「國家」的懷疑，成為現代日本和平主義思想的資源之一。日本著名存在主義作家安部公房（1924-93）的「無國籍思想」即與此有關，他的名作之一《野獸逃往故鄉》^⑬的主人公就是從「滿洲國」出逃的日本人。

在「奔走」的第三階段——隨解放軍部隊戰鬥、生活的過程中，他們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接受憶苦思甜教育，許多人的思想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共產黨部隊的平等、人道也使他們認識到日本軍隊的「非人」本質。橋口傑的《「戰爭體驗傾聽會」之記錄》^⑭，寫及日本軍隊殘酷的等級制度和非人的訓練方式導致士兵在戰場上從背後槍擊長官的事件。當過日本

兵又當解放軍的幅敬信這樣表達他對兩種部隊的認識：「日本軍隊，打人，上級強制下級。八路軍不一樣，那是上級愛護下級、下級尊重上級！」這種認識不僅使他們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者，甚至使一些人在思想轉變之後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野田明就是一例。根據他在《我走過的路》^⑮一文中的敘述，他生於1929年，1943年十四歲時參加滿蒙開拓青少年義勇軍到黑龍江的珠河，日本戰敗後當過蘇軍的俘虜，在中國農民家中當過苦力，1946年十七歲時參加解放軍，被編入東北軍區第一縱隊獨立二師三團一營機槍連。其後身經百戰，數次負傷。經歷了整風學習、土地改革運動、馬列主義學習之後，194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調防、行軍，轉黨手續不完備，在同年夏秋之間吉林大綏河鎮一帶的戰鬥中他第二次入黨。他當初參加解放軍的動機只是想了解解放軍之所以強大的秘密，因為1944年6月他被馬踢傷後在日軍大連陸軍醫院住院時，聽日本傷兵說過「八路軍紀律嚴格，非常強大」。

在解放軍部隊中建立起來的世界觀影響了許多日籍解放軍官兵的後半生。今村匡平1953年回國後，長期在長野縣的山區從事醫療活動，獲得了地方政府和民眾的讚譽。至於為甚麼能夠這樣做，1986年《在紅星下》被翻譯為中文的時候，他在中文版後記中明言^⑯：

這難道不是我在偉大的八路軍、人民解放軍中學到的「醫療是為了人民、必須為人民服務」的思想的實踐結果嗎？

川畑一子從解放軍退伍後曾被送進北京郊外的「人民大學」（並非現在的中國人民大學）讀了四年書，學習科學

社會主義。1958年回國後，她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日本依然保持解放軍時代的優良傳統，在地方小鎮努力從事社會公益事業。川畑在推廣養老金制度方面成績卓著，1984年榮獲日本厚生大臣的表彰。她在自傳的結尾處說：

我之所以能夠在任何環境下，都努力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以百折不撓的精神不斷進取，其根本則在於我從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學到的那種「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那精神已經融進我的血液中。我再一次體會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無論應用於何處都會成功。

這種表達幾乎是今村匡平那段話的翻版。

日本戰敗後滯留東北的日本人都急於回國，只好用抽籤的方式決定誰被八路軍徵用，1929年出生的溝脅千年女士不巧抽中了，於是迫不得已參加八路軍當護士。溝脅在軍中學習馬列主義、劉少奇的《論黨》等思想之後，中國竟成了她「思想的故鄉」。隨軍南下後，她在醫院裏愛上了入院療養的中國軍人、共產黨員杜江群，受其影響，共產主義信念更加堅定。由於種種原因二人未能結婚，但溝脅1955年回國的時候與杜江群約定了三件事：第一，一定加入共產黨；第二，永遠置身於日本民眾之中；第三，一定返回中國。她回到日本之後很快取得護士資格，在「全日本民主醫療聯合會」的京都上賀茂診療所工作，並在那裏加入了日本共產黨，為平民階層服務至今。那個醫療聯合會本來就是為救助日本的貧苦百姓而組織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當時有許多因為反對美軍在朝鮮半島開戰而被開除公職的日本共產黨員和民主人士都參加了。

中村義光、幅敬信等人，現在都在扶助從中國返回日本的「殘留孤兒」及其後代。一位名叫柳邦男的老先生於日本戰敗後在山西參加八路軍，1958年回國，現居京都。他在自家院子裏種菜吃，並對筆者說這是「發揚老八路自力更生的傳統」。

二十世紀馬列主義在亞洲的傳播給東方社會帶來了深刻變化。日籍解放軍官兵的思想歷程，正是探討這種傳播及其實踐形式的好標本。他們的思想和實踐顯然構成了「東馬」（東方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同樣成立於20年代初（日共的生日是1922年7月15日），曾經在反法西斯鬥爭和共產主義運動中密切合作。儘管1966年發生的中共對日共的「干涉事件」使兩黨關係陷入低潮，但60年代末日本「全共鬥」（類似中國紅衛兵的組織）的活動依然具有鮮明的「毛澤東色彩」。如果說「全共鬥」體現了中共影響激進的一面，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則以其對底層人士的同情體現了中共影響溫和的一面。

獨特的人生經歷改變了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也使他們的國家認同感發生了變化。曾經有過的「日本人優越感」被克服，「與龍之子共生」成為一種寶貴的人生價值。晚年的川畑一子明言自己「身在日本、心繫中國」。筆者所認識的許多日籍解放軍官兵都把來中國稱作「回娘家」，而且「回娘家」一詞完全用漢語發音。這個表達帶有幾分溫馨的鄉村情調，意味着他們青少年時期所受的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影響已被徹底消除，甚至「日本國」都成了「婆家」，他們不過是嫁到日本的「中國女兒」。日本護照和「回娘家」的並存，意味着「國家」之外的標準的建立，或者說他們已經變為「無國籍群體」。

二十世紀馬列主義在亞洲的傳播給東方社會帶來了深刻變化。日籍解放軍官兵的思想歷程，正是探討這種傳播及其實踐形式的好標本。如果說日本受文革影響的「全共鬥」體現了中共影響激進的一面，那麼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則以其對底層人士的同情體現了中共影響溫和的一面。

四 平民視角與歷史認識

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歷史敘述作為一種「民間寫作」，不僅在歷史事實的層面上補充了正統的歷史敘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價值觀的層面上，其平民意識也補充了官方寫作以及與此存在共謀關係的學院派寫作，甚至具有修正和顛覆的功能。將他們的敘述與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結合起來看，這種顛覆功能越發顯著。

2001年夏天，由「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其成員主要是「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的成員）編輯、扶桑社出版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在日本文部科學省的相關審查中「檢定合格」，近二十年來日本與中韓各國由於歷史認識問題產生的衝突達到白熱化，波及到政界與學界、政府與民間。旅日中國學者專門編輯出版了《斬決「新歷史教科書」》^⑩；韓國人舉行大規模的抗議活動；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著名作家加藤周一、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等人為首的有良知的日本知識份子也開展了「新歷史教科書」批判運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常常在史實的層面上拙劣地「編纂歷史」，反駁方也不得不重複一些本來沒有必要重複的史實，因此對話有時候停留在很淺的層次上。

不過，從國家意識形態的角度看，漏洞百出的「新歷史教科書」倒是用誇張的形式暴露了「歷史敘述」的本質。歷史並不僅僅是曾經發生的事實，而是一種被記憶、被認知的過去，因此歷史永遠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揭示歷史書寫本質的，往往不是史書中真實的部分，而是不真實的部分。湯因比 (Arnold J. Toynbee) 在《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 中指出^⑪：

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歷史研究都同其他社會活動一樣，受到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佔據主導地位的思想傾向的控制。

直接、全面控制歷史敘述的，是國家意識形態。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說得坦率：「歷史就是國家的記錄。」到目前為止，正統的歷史敘述大都是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之內進行的。「民族—國家」不僅成為歷史敘述的背景，歷史敘述本身也往往成為強化「民族—國家」意識的手段。統治者希望用歷史記述來闡釋現實自我的合法性並超越現實自我的有限性，以「青史留名」。當歷史敘述和其他社會科學研究一樣成為國民國家建設之手段的時候，被篡改幾乎是「歷史」的宿命，歷史學因此轉換為政治學、甚至轉換為神學。「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曾經把來自國外的抗議斥責為「內政干涉」，這斥責不僅對日本學者的批判「失效」，而且暴露了他們把歷史問題「行政化」的非學術態度及其歷史著述行為的「工具性」。如果我們注意到日本是在戰後經濟發展達到頂峰的1982年前後開始修改歷史教科書，就會明白以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國家實力怎樣介入歷史敘述。在實力方面佔有絕對優勢或者已經獲得實利的情況下，歷史認識問題甚至是可有可無的。美國在日本列島修建了許多軍事基地，俄羅斯至今佔領着日本的北方四島，因此他們並不像中韓各國人士這樣關心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

所以，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問題實際具有兩個層面。顯而易見的是對歷史事實的篡改，而篡改背後是潛在的「國家—民族」框架支配的歷史敘述規則。雖然明目張膽篡改歷史事實的行為不多見，但那個規則卻同樣潛

正統的歷史敘述往往成為強化「民族—國家」意識的手段。因此日籍前解放軍官兵的「民間寫作」，不僅在歷史事實的層面上補充了正統的歷史敘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平民意識也具有修正和顛覆官方寫作的功能。對照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來看，這種顛覆功能越發顯著。

藏在其他國家的歷史敘述之中。就中國而言，眾所周知的是建國後的現代史長期漠視國民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的巨大貢獻。《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宣布，證明中國的歷史認識曾經有過問題。日本右翼學者因為歷史教科書問題受到中國方面批判的時候，在《產經新聞》上連續發表文章，反唇相譏指出中國不同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對同一歷史事件敘述的矛盾（比如有關斯大林、蘇聯的部分）。面對類似的指責，中國學者往往只能沉默。

這樣，在顯見的史實層面上對日本教科書的批判只能是部分有效的，更有效批判應當指向其背後的「國家敘述」邏輯。正是在這個層面上，「民間敘述」有了特殊意義。「階級」作為一個族群劃分的尺度與「國家」這一尺度形成了交叉，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之內，人也有等級之分（與此相對應歷史書寫者也有等級之分）。「民間敘述」之所以具有解構「國家敘事」的功能，是因為在歷史過程中國家與個人並不總是「利益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斯主義的階級論觀點永遠具有生命力，階級可以成為超越「國家」、實現「國際主義」的工具。

前述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對滿洲殘留日本人慘況的記述，就是從平民的角度證明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由於他們知道自己最初是作為日本殖民政策的工具進入滿洲、清楚自己兼具加害者與被害者的雙重身份，因此他們對自己災難的描述具有從內部批判日本殖民主義的功能，而不至於充當某些日本人把「日本」打扮成單純受害者的藉口。橋口傑、成岡睦美等人的記述都強調了日本「武裝移民」者的軍隊

性質、寫及開拓團搶奪中國農民的田地。歷史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切身體驗，而不像在某些日本歷史學家和政治家那裏，僅是一種外在的認識對象，因此他們作為歷史當事人的敘述更有說服力。他們的敘述摧毀了那種從「精英史觀」、「天皇中心史觀」出發編造的歷史圖景。

關於「新歷史教科書」，《歷史教科書問題何在》（《歷史教科書何が問題か：徹底検証Q&A》）^⑨一書的「前言」指出：

這是一種立足於國家精英視角的歷史敘述，歷史上被支配者，被歧視、被侵略的人們的觀點與行動，只在極小的比重上被承認。

確實如此。當西尾幹二、藤岡信勝等人從「皇國史觀」出發「編纂歷史」的時候，完全漠視了「民間」、漠視了日本戰敗前後包括「在滿日本人」在內的日本民眾的悲慘命運。這種漠視與日本戰敗時日本軍國政府對「滿洲開拓民」的拋棄具有同構關係。就是說，那些不幸的「在滿日本人」被日本遺棄兩次：第一次是在歷史進行的過程中，第二次是在日本右翼學者敘述歷史的時候。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自由主

日籍解放軍官兵回國後成立了許多小組，回憶在中國的戰鬥生活，推動中日關係的發展。例如，回想四野會、九江會、桓仁會、長白會、長城會等。回想四野會成立於1970年，成員多為當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者。這是1982年回想四野會成員集會時的合影。第二排右五為中村義光，右七為橫山甲子藏，右上角為成岡睦美。



成岡睦美提供

1989年成立的「富士講述會」，組織親歷戰爭災難的日本老人向中小學生、社會各界講述戰爭與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從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到和平主義、人道主義——這是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共有的思想脈絡。儘管其聲音微弱，未能進入大眾傳播系統，但他們還是在日本社會裏頑強地敘述着自己的歷史，發出自己的聲音。

義史觀」和當年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一樣，具有反人民的性質，包含着「國家」之外的道德問題。眾多「國民」肉體和心靈的苦難是「滿洲國」的遺產之一，這份遺產本應成為歷史學家的思想資源，但日本的右翼歷史學家卻加以拒絕。

從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到和平主義、人道主義——這是日籍前解放軍官兵共有的思想脈絡。儘管聲音微弱，未能進入大眾傳播系統，但他們還是在日本社會頑強地敘述着自己的歷史，發出自己的聲音。在這方面，橋口傑的做法值得關注。為了擴大影響力，橋口傑於1989年發起成立「富士講述會」，組織親歷戰爭災難的日本老人向中小學生、社會各界講述戰爭的罪惡，並將講演稿、交流內容印刷成冊，贈送給學校、圖書館、政府機構等公共設施。「富士講述會」日語寫作「富士の語り部」，「語り部」本來是日本古代以講述傳說、典故為世襲職業的部族，家住富士山南麓富士市的橋口傑，把「富士」與「語り部」組合在一起作為講述日本軍國主義罪惡的民間組織的名稱，是意味深長的。日本社會能夠在何種程度上了解和接受他們的歷史敘述，已經成為認識日本社會性質的一個尺度。

註釋

- ① 《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北京：人民軍醫出版社，2000）。
- ② 橫山甲子藏：《流轉の青春——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從軍記》（日本長野縣：個人印刷，1986）。
- ③ 川畑一子：《大河の流れのように》（東京：光陽出版社，1999）。
- ④ 橋口傑：《忘れ難き大地・第一部・慟哭の満洲》（日本静岡縣：個人印刷，2001）。

⑤ 成岡睦美：〈あの戦争の死者のため〉，《産経新聞》，1996年6月11日。

⑥ 中村義光の兩篇文章均收入氏著：《藤井の雜記》（日本山梨縣：個人印刷，1984）。

⑦ 幅敬信寄給筆者的打印稿，2002年4月。

⑧ 本間雅子：《若き日の代償——中國の解放戦争に参加して》（日本山口縣：個人印刷，1991）。

⑨ 引自《第四野戰軍衛生工作史》。

⑩ 二森範子：《龍の子と生きて》（日本：こうち書房，1995）。

⑪ 岡晴之：《青春萬里》（日本德島縣：德島出版，1988）。

⑫ 參閱水口春喜：《大いなる幻影：滿州・建國大學》（東京：光陽出版社，1998），第三章所引武藤富男的文章。

⑬ 安部公房：《けものたちは故郷をめざす》（東京：講談社，1957）。

⑭ 橋口傑：《「戦争体験傾聴會」之記録》（日本静岡縣：個人印刷，2002）。

⑮ 野田明：〈私の辿つた道〉，收入《中國・回娘家》（日本静岡縣：個人印刷，2002）。

⑯ 中譯本名為《在中國的奇遇》（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87）。

⑰ 王智新等編著：《「つくる會」の歴史教科書を斬る》（東京：日本僑報社，2001）。該書是直接出版日文版，並受到日本民間人士的資助和中國駐日使館的支持，在日本社會有一定影響力。

⑱ 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著，劉北成、郭子凌譯：《歷史研究》「修訂插圖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一章，「歷史思想的相對性」。

⑲ 小森陽一、坂本義和、安丸良夫合編：《歷史教科書何が問題か：徹底検証Q&A》（東京：岩波書店，2001）。

董炳月 江蘇睢寧人，1960年生；1998年以論文〈從新村到「大東亞戰爭」〉（日文）獲東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